

我国生产力 发展的 理论与实践

武文军

兰州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三十九年来发展生产力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重点分析、研究和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发展生产力的新鲜经验。全书从不同的角度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在生产力问题上的各种“左”的观点和反科学的理论，对生产力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提出了独到的新颖的见解，对人们研究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很有启发性、开导性。作者善于用清晰的思路，明快的笔调，深入浅出的表达方法，阐明一些本来显得深奥的理论问题，使作品具有理论探索性、通俗性、普及性和可读性相结合的特点。

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武文军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大学校内）

《兰州晚报》社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5.6

1983年6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140千字 印数：1—10000册

ISBN7-311-00153-5/D·28 定价：1.70元

序 言

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对建国以来近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十年改革、开放和建设经验的肯定和发展，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

为了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生产力方面的经验教训，澄清在生产力问题上的理论是非，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十年间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重大发展和对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贡献，笔者以《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题，写了这部研究我国生产力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著作。

本书从以下几方面考察了我国生产力的问题：第一，考察建国近四十年来，我国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同时批判地分析了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错误认识。这一部分还重点考察和分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十年。对这十年我党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理论突破和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重大措施作了初步研究。第二，分析建国后有关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文献，主要分析了从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三大”期间的一些重要决议和党代会、中央全会的有关文献，弄清过去在生产力问题上党在

*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决策上的错误，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方针的重大意义。第三，考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新鲜经验。这部分首先揭露和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干扰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基本错误理论，即“越大越公越优越”的理论。然后，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成就。第四，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利用国际生产力的理论与实践。这一部分在批判地研究了近百年我国闭关锁国、封闭国际生产力的沉痛教训后，转而用较多的篇幅剖析建国后对外的“批判主义”思潮及其恶果。紧接着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放政策的产生、发展，我国利用国际生产力的理论、方法、步骤、措施。第五，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对我国生产力解放的巨大作用。首先，批判地分析了建国后的一种“左倾革命思潮”，揭露其理论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破坏性。以告诫人们决不应把那种“革命”与今日的改革相混淆。这部分重点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以改革作为启动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成就，也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年来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创造。第六，对生产力理论体系的新认识和新阐述。对传统的生产力的定义、生产力的要素观提出了批评，揭露了其片面性和在实践产生的恶果。同时，提出了广义生产力的新定义。对生产力发展中的具体矛盾作了分析，阐述了生产力体系中的八对矛盾关系。对生产力标准与真理标准的关系和“精神生产力”的问题作了专题分析研究。这一系列分析探讨中，都表述了作者自己独立的看法。自然，这些探索也是尝试性的，今后有待于实践的验证，有待于进一步深化。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力图遵循两条写作原则：其一，求实的原则。在写作中没有先验地受什么条条框框戒律的束缚，以收集

分析我国近四十年关于生产力问题的文献资料、历史事实为出发点，从分析实际状况中作出结论，提出看法。例如，对近百年我国的学者、官吏对国际生产力的看法，笔者提出的评价，都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没有囿于既成的历史结论。再如，对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关于干扰农村生产力的因素，提出了“一个公式”，“八条绳索”的结论，这都是在研究了三十多年农村发展中的大量史实后作出的，没有受传统看法的影响。其二，探索的原则。在关于生产力问题上，我国长期形成了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至今干扰着改革、开放和建设。为此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冒着一定的风险，批评和否定了关于生产力的一些古老的过时的观点，并且根据我国近十年生产力发展的实践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例如关于生产力要素的看法，关于国际分工的看法，关于所有制的看法，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看法，关于全世界社会主义“通病”的看法，都提出了自己新的观点。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许多历史文献、政策文献，也参考了国内一些总结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经验的读物，拜读了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书中相当多的观点是集众家之言。

本书的主要篇章曾给甘肃省、兰州市的一些干部印发过，笔者并按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作过二十多次学术报告。本书部分章节曾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科学》、《兰州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并得到了上述各刊物编辑部的支持和修订，特此致谢。

作者

1988年5月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建国后我国生产力发展问题的历史考察…………… (1)

- 一、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是怎样被曲解的…………… (1)
- 二、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怎样被贬责和抑制的…………… (8)
- 三、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生产力发展的黄金时代…………… (15)

第二章 建国后我国生产力发展问题的历史文献…………… (29)

- 一、从“八大”到“十一大”历次党的重要会议对生产力的评价…………… (29)
-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生产力认识的根本变化…………… (34)
- 三、党对生产力认识的演变图式…………… (39)

第三章 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新路子…………… (42)

- 一、一个长期困扰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错误公式…………… (42)
- 二、束缚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八条绳索”…………… (48)
- 三、我国农村找到了用商品经济形式致富的路子… (58)
- 四、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所走的是

一条致富的路·····	(82)
-------------	--------

第四章 我国的开放与国际生产力的利用····· (84)

- | | |
|--|---------|
| 一、对待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错误····· | (84) |
| 二、建国后左倾“批判主义”隔离着中国与
世界先进生产力的联系····· | (90) |
| 三、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在吸收国际生产力上的
重大进展····· | (100) |
| 四、三中全会以后在认识国际生产力上的
理论突破····· | (108) |
| 五、进一步利用国际生产力的对策····· | (119) |

第五章 改革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启动动力····· (125)

- | | |
|---------------------------------|---------|
| 一、左倾“革命思潮”的形成及历史教训····· | (125) |
| 二、我国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生产力发展的
实践活动····· | (133) |
| 三、改革过程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理论创造····· | (143) |
| 四、改革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 (155) |

第六章 关于生产力理论体系的再认识····· (159)

- | | |
|---------------------------|---------|
| 一、从狭义的生产力观过渡到广义的生产力观····· | (159) |
| 二、作为大系统的生产力及其矛盾····· | (162) |
| 三、精神生产力及其与物质生产力的“合流”····· | (169) |

第一章 建国后我国生产力发展

问题的历史考察

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在我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有曲折的经历。三中全会（本书均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被从多方面予以曲解，生产力的发展在实践中受到多方面的阻碍、抑制和破坏。三中全会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在实践上也放在了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党的十三大对发展生产力作出了十分明确的规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初级阶段，为了摆脱贫穷和落后，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个结论是对近4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现在就社会生产力在我国从理论到实践的命运问题作个考察与分析。

一、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是怎样被曲解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左倾错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生产力进行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和干扰。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生产力学说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贬责和曲解。主要表现在：

把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要素等同于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从而把一素要素的生产力要素从生产力中要除出去。马克思把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看成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而且指出

社会生产不仅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而且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过程，生产过程不仅创造使用价值，创造物质财富，而且也是价值的创造和增殖过程。他从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方面的复杂关系和作用出发，提出了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问题。在《资本论》中讲到商品生产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时，他说：“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而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纯粹的自然条件”。从这一段论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能够进入生产力要素的至少有五项：（1）人的智力和体力因素，这就是所谓具有“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者”，（2）科学技术的因素，即“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3）生产的社会因素，即所谓“生产的社会结合”，（4）生产的物化劳动因素，即“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5）自然的因素，即“纯粹的自然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

当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生产力的要素后，转而再分析直接生产过程时，又提出劳动过程的要素：“劳动过程分解为下列简单要素：（1）人本身的活动或劳动本身；（2）劳动对象；（3）劳动资料。^①”这是他舍象掉流通过程，考察纯粹直接生产过程时所揭示的生产要素。长期以来，问题就出在一些人把马克思关于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的要素解释为社会生产力的一般要素，从而出现了“三要素”说。苏联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多讲生产力“三要素”。斯大林则不同意把劳动对象看成生产力要素，提出了“二要素”之说。他说：“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工具，以及有一定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术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

①《资本论》法文版中翻本19页。

——所有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力”^①。这就把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作为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因素，而排除了马克思讲的其他一些因素。自此以后对生产力要素的认识就陷入了片面之中。

“二要素”说在毛主席那里，干脆取掉了一切定语，直接了当地说：“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②。这里讲的是一般的人，连人群中的“劳动者”与非劳动者也不区分了，对生产工具也不再强调能“用来生产物质资料”的工具，而是指抽象的一般工具。自此以后，我国的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开始把马克思的生产力学说更往俗庸化的方向发展了。最后形成了一种片面的看法，只要有了人，就算拥有了生产力；而作为生产力的人则主要指工人、农民二阶层。而对工人、农民的素质要求主要是体力和胆量，把知识和才能被放在可有可无的位置。至于工具，似乎越笨重越好，甚至说这个“白手起家”，那个只用“土”办法就创造了奇迹，还有什么有条件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等等，马克思的社会生产力学说被俗庸化到“文盲加铁锹等于生产力”的地步。

把生产力中的智力因素加以贬斥，从而把脑力劳动看成生产物质财富的对立物。认为科学是一般意识意态，科学技术不能构成生产力。曾一度把马克思提出的、被邓小平同志重申的科学是生产力的观点，大加鞭笞。认为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两种人创造的。认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一不作工，二不种地，往往会变成社会的赘瘤。因而，不是要求知识分子把科学技术带到生产领域，转化为生产力，而是要知识分子抛弃原识来的所谓“旧知识”，参加体力劳动，接受传统经验的“再教育”。同时，又把浮浅的未经科学实践鉴定的经验当成一般

①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知，强行推广，甚至把些伪科学、错误经验、瞎点子推行到生产领域。

把生产力看成是原始自然力，否定生产力的时代标准，广泛推行自然经济时期的生产力要素。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时，总是从运动的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认为生产力的要素都是历史地发展着的，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要素，其具体内容和时代标准是不一样的。他在讲到生产资料时，强调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强调时代的水平。他说：“劳动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不能没有经过加工的资料”。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劳动者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①。但是，我们把这些观点置诸脑后，长期认为落后的生产工具同社会主义的时代是协调的，一致的，甚至把机械化、电气化都看成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志。过分地强调只要有两只手加一把揪，就可以创造人间奇迹。而对生产力中劳动者这个要素不讲知识素养的提高，技术的熟练程度，只讲“方向”对不对，“立场”对不对和“胆量”大不大。甚至提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产”的谬论。在许多场合，讲生产力，只讲人的生理的原始自然力。例如，把人口众多，不是作为进行社会生产的条件，是可能的生产力，而看成直接的生产力。否认自然力要成为生产力，自然条件要成为经济优势，必须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这样，使生产力成了离开了历史发展过程的纯粹抽象的原始自然力，包括人的原始生理机能和自然界的各种原始存在物。从而自1957年开始，大讲人口多是决定国家昌盛的基本因素。1957年提出“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五八年提出“六亿人

^①《资本论》法文版中译本198页。

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而把人口多，土地大作为强盛的标志，导致多生多育、广种薄收，人海战术，还无节制地垦荒挖坡，出现越垦越穷的局面。

把政治暴力看成了先于生产力、高于生产力的因素，把政治目标看成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马克思主义者也讲政治暴力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但其本意是指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如果生产关系腐朽了，就同生产力发生矛盾冲突，这时就要摧毁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为生产力发展创造一种适应的形式。但政治暴力归根结蒂是受生产力制约的，恩格斯认为“暴力也是一种经济力。”这个观点在我国很长时间被彻底曲解了。一度曾提出了生产力要靠抓阶级斗争来推动，抓革命才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抓好了，生产就自然上去了。党的“九大”报告竟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强调不批判修正主义，不搞上层建筑的革命，不打倒所谓叛、特、反，就不能发展社会生产力。^①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要向物质丰富的共产主义过渡，主要靠阶级斗争和国家的专政机器的作用。甚至把生产的目的不是看成创造物质财富，而看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提前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在粉碎“四人帮”一年之后的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仍然没有把发展国民经济，看成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而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是战胜资本主义和巩固国防所需要的，也是给共产主义创造条件。^②总之，把政治暴力、国家机器，看成生产力的动力，而把生产力则看成政治权力的附属品。

把唯意志论推行到生产过程中，长期忽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

^①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

^②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

规律。建国后，对普遍提高劳动者的素质重视不够、措施不得力，把生产力发展的动因放在“群众的觉悟”、大家的“政治热情”和“干劲”上。从一些发展战略到年度计划或具体生产活动，都曾染上了浓厚的唯意志论的色彩，在许多场合曾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视到底是现实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大肆宣扬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认为“政治运动”、“大批判”、“拔白旗、插红旗”，可以把生产力推进到很高的发展程度。1958年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充满着唯意志论的色彩，而在毛泽东主席当时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的鼓动性文件中，把“思想革命”和“共产主义精神”看成赶上资本主义大国的决定性因素。指出：“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的时间了。”此后，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提出“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在全国广为宣传。到“文化革命”期间提出了一个极其荒谬的理论，就是“穷过渡”理论，认为越贫穷的国家，越穷的社会阶层，越革命，越可以迅速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因为“穷则思变。”且不知思变和真变之间还有视大的距离。这就从根本上颠倒了主观意识与客观存在的关系，把生产力看成可以受人的意志随意支配的奴仆。而不是把生产力看成客观的物质力量。尤其是否定了生产力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个理论带来的恶果是高指标、瞎指挥以及对生产力的全面破坏。

把生产力发展中的全部社会关系看成阶级关系，给生产力贴上阶级的标签，曾经提出了穷是动力，富变修的口号，讲穷要穷，平富共产。认为生产力发展了，一些人拥有较多的物质资料和文化生活资料，必然向剥削阶级转化，另外一些物质财富少的人必须变成

赤贫。所以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提发展生产力、搞经济、搞建设，总要把最穷的作为依靠力量和骨干，变富的作为打击对象，至少是限制对象。特别是1962年以后，在农村大讲依靠贫农、下中农，打击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对生产力的破坏更严重。把生产力发展中属于社会管理的某些因素也看成阶级关系的表现。在农村、城市从多方面限制生产力要素的发展，农民不能多养一只羊，不能搞多种经营，不能有家用机器。否则，就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办法、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一概认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抵制、批判，而把我们自己的小农业管理方式认定为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管理办法。

左倾错误泛滥时期，一些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学说的主要手法是教条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们从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中摘引无数条关于战争年代、革命年代发动暴力革命的词句，从这些词句的归纳和解释中给人一个系统的看法：似乎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任何场合都是“阶级斗争为纲”论者，而生产力则是在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大家看一下林彪在“九大”的报告，从开头到结尾，都充满着“打”、“斗”、“批”、“继续革命”等词藻，发展生产力被看成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集中表现。这个论点是由无数“语录”串起来的。同时，很长时间内一些人还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曲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当在掀起阶级斗争风浪时，就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专政主义”，认为生产是和专政对立的，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是有害的，“红是主要的”；而当要搞经济上的高指标时，又要把马克思主义解释成唯意志论，认为革了思想的命，自然的命就报好革了，可以在短时间内赶上英国和美国。

二、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是怎样被贬资和抑制的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进行曲解的同时，发展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曾遇到了更加悲惨的命运，经历了多次的曲折和磨难，留下了沉痛的教训。

建国39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如下一些阶段：

1949年到196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以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动力来发展生产力。在1949年9月制定的《共同纲领》中，提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当时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方针是：坚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同1949年前党以组织革命战争为主要任务的工作中心相比有了重大变化，开始把生产力放到了重要地位。但是，这个时期什么是发展生产力的基本动力呢？认为动力是部分地变革生产关系和整体上进行上层建筑的革命。当时进行了“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运动，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从实践上看，旧中国生产关系十分腐朽，建国初期针对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状况，采取了通过部分地变革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方面实行巩固政权的措施，事实上起到了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到1952年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八百二十七亿二千万元，比1949年增长77.5%。工业总产值达到三百四十三亿三千万元，比1949年增长145%。农业总产值达到四百八十三亿万元，比1949年增长48.5%。但是，取得政权之后，是否对生产力的地位就如此描述，而发展生产力是否就要以革命为主要手段，这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我们必须看到，当时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运动，固然打击了阻碍

生产力发展的腐朽因素，但是，也应看到激烈的斗争伤害了一些发展生产力的人力、财力、物力，失去了一些本来使生产力可以恢复得更快的条件。

从1952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是以变革生产关系为主线来发展生产力。在这个阶段提出了一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把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平行的双重任务提出来。反映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反映生产关系变革的任务是“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双重任务都实现了一些。尤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进度快，成绩显著。1956年春全国成立了108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亿6百万农户入了社，占农户总数的90%；1956年6月底，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劳动者加入了合作社，林业、渔业、运输业和小商贩等个体经济，基本上合作化；1956年3月，全国除西藏外，全部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这个阶段，对生产力在实践上和认识上的重要收获有两个：一个是党在1956年9月份召开的“八大”上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提出了当前的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个收获是认识到科学和知识分子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报告中讲：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从1957年到1966年这个阶段形成了统制式经济管理体制，生产力在统制的状态下缓慢发展。人们把1957年到1966年初称为一个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事实上，真正进行全面社会主义建设

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点是用集中的统一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导经济工作。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把一大批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打成右派，在农村谁也不敢讲单干、自由贸易的作用。在全国造成了一种禁止思维的空气。这一年已经出现了一种错误认识，就是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意识形态的革命。当年经济确有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前几年调整生产关系，鼓励生产发展的结果，而一些人却错误地认为成绩来自反右斗争。1958年在工作问题上，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的进一步变革作为重点，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过早过急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典型，是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群众运动。大跃进表面看来是发展生产的运动，实际上却不然，它是作为一种“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手段。认为有了越大越公越好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就应当凭主观愿望发展了，于是出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瞎指挥、高指标。这个时期可称为全面的命令经济。把钢的指标人为地定为1070万吨，为此用行政命令把农业战线和文教科研、党政部门以及其它经济部门的劳动力，抽调到矿山进行土法炼钢，使大片庄稼无人收割，遭受损失；与此同时又刮“共产风”，搞公共食堂，部分供给制等等，全国的资源和社会经济遭到空前的破坏。而1959年又提出“特大跃进”。1960年底到1961年，虽然开始注意纠正左倾错误的危害，但仍然没有按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对经济发展作出科学决策。只是人为地下放城市人口，把大量人力动员到水利阵地、农业第一线。全部经济过程仍然在行政命令下进行。与此同时，“大批大斗”和“共产风”并未终止。当时经济发展速度急剧下降，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性后果，一些人在饥饿中死亡了，一些劳动力衰退了。尽管1961年和1965年进行了经济调整，似乎要注重发展生产力了，然而，这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办